

崇禎傳

樊樹志著
人民出版社

崇

禎

傳

人
傳
禎
崇

崇 祯 传

樊 树 志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维训
装帧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诸晓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崇祯传/樊树志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1

ISBN 7-01-002492-8

- I. 崇…
- II. 樊…
- III. 崇祯帝-传记
- IV. K827.48

崇祯传

CHONGZHEN ZHUAN

樊树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9.375

字数:467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7-01-002492-8/K·534 定价:34.10元

序 言

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中，深有所感地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种惊世骇俗的议论，令历史家们拍案叫绝。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不仅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但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是达成自己目的的工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工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文学家在小说中以艺术的手法演绎历史，历史家在史著中以实证的手法展现历史，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这本崇祯皇帝的传记，写了他的一生三十几年的历史，如果要概括成一句话，那便是：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清朝编纂《明史》的史官们，曾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即万历）”的感叹。明清史的一代宗师孟森把这种感叹加以引伸，从一个宏观的视角议论道：熹宗（即天启），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即崇祯）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实在是精辟之极的见解！历史让崇祯皇帝演出了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他成了历史的奴隶！当时他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危机，内忧与外患的任何一方都有足够的力量灭亡这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衰朽王朝，要他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抉择中，挽救

行将衰亡的王朝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

崇祯在有明一代，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时运不济，他接手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衰亡的征兆在他出生之前早已初见端倪。他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终于未能成功。这是一场悲剧，个中缘由错综复杂。历史，波诡云谲变幻莫测，它提供了帝王们驰骋的舞台，让他们施展才干，但时机稍纵即逝。消失了的历史，再也不可能重新作一番演绎，使后人对历史发展格局所作的任何假定，变得毫无意义。不过，人们带着这种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十七世纪上半叶这段令人感慨歔歔的历史时，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崇祯是一个有棱有角锋芒毕露的人物，十七年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复杂多变的形势，层出不穷的棘手难题，需要他去面对，强大的压力使他的品格发生裂变。在他身上，机智与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着，兼而有之，他励精图治，自律甚严，但求治之心太切，结果适得其反。他深知用人是第一要务，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但用而不专，疑神疑鬼，翻脸不认人，从阁部大臣到封疆大吏，更调频繁，惩处随意，搞得臣下畏首畏尾，离心离德。他勤于理政，事必躬亲，常朝从不停辍，召对时时举行，十七年来未稍懈怠，但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终于成了孤家寡人。及至魂归煤山，陪他而去的只有贴身太监一人，愿为他的社稷殉葬的也不过寥寥数人而已。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令人感到震撼，思绪万千。

中国一向有“以古喻今”的传统。笔者以为，历史与现实固然不能割断，但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在一个正常的政治氛围中，人们原本大可不必借历史来影射现实。史论与时评，毕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历史学家大可秉笔直书，不必提心吊胆地提防人们的联想，而束手束脚，三缄其口，把原来简单明

瞭的史事写得闪烁其辞，扑朔迷离。这是我的出发点。我想以尽可能客观冷静公正的心态为崇祯立传，其间可能有些见解有悖于以往流行的传统观点，那是历史理解的视角有所不同，乃百家争鸣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的话，本书也就没有问世的必要了。

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历来为开国英主写传者多，为末代皇帝写传者少。然而，创业难，守成更难。开国英主叱咤风云的英雄业绩，读之令人振奋；末代君主于内外交困之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壮一幕，读之令人感慨，发人深省。出于这种考虑，笔者乐意把明朝末代皇帝十七年的政治生涯重现出来，把十七世纪上半叶那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匆匆过场的这位悲剧人物的喜怒哀乐展示出来，让读者从现世的喧嚣繁忙中抽身出来，去品味三百多年前发生在紫禁城里的一段往事，或许并非无益之举。

崇祯皇帝在闯王进京之际，仓促吊死于煤山。自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来，人们把这个人物当作“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的评价。本书无意于写什么翻案文章，只是对以往过于简单化的评论模式表示些许质疑，以为不必意气用事，汲汲于贴标签，而应该尽可能客观冷静公正地再现那一段历史。非黑即白的形而上学判断，应予摒弃。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人，去评论明清鼎革之际改朝换代中的这位君主，似乎可以超脱一些，不受各种非历史因素的干扰。这样，庶几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写完这本书之后，感慨良多。倒不是有感于传主命运的坎坷，而是有感于我所从事的专业——历史学每况愈下的境遇。

不管社会如何看待历史与历史学，我们自己不能消沉，要深刻地反省自身。在缅怀辉煌的过去的同时，不能不承认史学存在脱离社会的潜在危机，由来已久。这种危机并非中国所独有。据史学史专家的考察，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中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愈来愈

愈注重于深刻的分析，为此引进了各门学科的方法，从而使它变得日趋深奥，轻视或鄙弃传统的方法——记叙与描述，结果把活生生的充满人类丰富多彩活动的一幕幕活剧，写成了抽象的社会蓝图或数理模式，历史著作成了不受公众喜欢的枯燥乏味的冷冰冰的“砖头”，失去了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失去了读者。这种情况，已经引起明智的历史学家的警觉，于是不少人喊出了“复兴记叙体”的口号，引人入胜的事件和人物重新受到重视。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其实，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何尝不是如此，它们的许多篇章，可以与脍炙人口的文学大师的散文佳作相媲美，读来朗朗上口。有意思的是，当代美国的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所写的一系列叙事史作品，好评如潮的道理也在于此。从他的汉名中，人们依稀可以窥见这位西方学者对司马迁的景仰之情。而我们自己却淡忘了这种优良传统，实在令人遗憾。

成功的历史学家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侧面的。著作等身的一代宗师朗克（Leopold von Ranke）深有所悟地说，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就其寻求史料、确定史实等方面来看，史学是科学，但史学并不到此为止，它要求叙述和再造。作为科学，它与哲学相关；而作为艺术，它又与诗歌相近。在他之后的英国史学家马考莱（Thomas Macaulay）的作品以叙述生动细致著称，无论是叙述事件或是描摹人物，都能栩栩如生，扣人心弦。他曾经说过，历史著作应该让我们的祖先以他们自己的语言、方式和装束出现在我们面前。因此他的著作特别注重形象生动的细节描写，饶有兴味。另一位英国史学家屈维廉（George Treve Lyan）一生写下大量文笔生动受人欢迎的作品，继承了“文学史学”的传统，追求一种美，一种趣味，一种联想。以描述见长的屈维廉的历史著作，读来犹如生动流畅的散文，既可以研究为目的阅读，也可以欣赏为目的浏览，使

他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

有鉴于此，我在写历史人物传记时，尽量避免以往一些通史、断代史、专史著作中那种刻板沉闷，令人望而生畏的章法和笔法，追求一种生动活泼的叙事史风格，注重情节、对话，注重形象、具体，使一般读者能轻松自如地读下去。先前在写《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时已注意及此，此次写《崇祯传》力图更理想一些。

写历史人物传记，与写一般历史著作明显不同之处，是必须树立传主的形象，刻划人物的性格，不能平铺直叙面面俱到地写成一笔流水账。古希腊传记体史著奠基人普鲁塔克(Plutarch)在他的名著《亚历山大传》序言中，曾经这样透露他的心得：我所写的，不是历史的书，而是一部传记。一些小小的行动及语言，常常比大事件更能显示一个人的性格。正如画家画一幅肖像时，他只抓住脸庞和眼神，几乎不考虑身体的其他部分。我也把大事迹或战争部分，让给他人去写，我只写人物心理方面的特征，用这种方法来叙述或描写每一个英雄或伟人的传记。笔者以为这是值得借鉴的传记笔法。当然，帝王并非个个都是英雄或伟人，但关于他们的传记的写法，则大体是有共同之处的。话虽这么说，做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相当的功力和识见。多年来形成的固定程式、习惯困扰着自己的思绪，要追求一种新颖的章法和笔法，常常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时不时地流露出为旧传统所束缚的痕迹。《崇祯传》想写得洒脱一些，似乎未必尽如人意。这大概也算是积重难返积习难改吧！

目 录

| | |
|-------------------------------|---------|
| 序 言 | (1) |
| 第一章 受命于危难之际 | (1) |
| 一、“召信王入继大统！” | (1) |
| 二、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 | (16) |
| 三、定阉党逆案,毁《三朝要典》 | (32) |
| 四、昭雪冤狱,弘扬正气 | (51) |
| 第二章 刻意营求中兴之治 | (61) |
| 五、寄厚望于袁崇焕 | (61) |
| 六、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 | (73) |
| 七、己巳之变:袁崇焕的悲剧 | (87) |
| 第三章 忧勤惕厉,殚心治理 | (104) |
| 八、“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 | (104) |
| 九、“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 | (117) |
| 十、“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 (133) |
| 十一、“朕万不得已遣用内臣” | (148) |
| 第四章 “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已肥家!” | (162) |
| 十二、钱谦益案 ——会推阁员引发的党争 | (163) |
| 十三、钱龙锡案 ——袁崇焕之狱引发的党争 | (184) |
| 十四、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 | (195) |
| 十五、“崇祯皇帝遭温了!” | (203) |

| | |
|-----------------------------|-------|
| 第五章 举旗不定的抚与剿 | (226) |
| 十六、黄土高坡上的造反大军 | (226) |
| 十七、杨鹤抚局之败 | (233) |
| 十八、洪承畴荡平陕西 | (250) |
| 十九、战火蔓延山西 | (256) |
| 二十、澠池渡：一发而不可收拾 | (268) |
| 二十一、车箱峡：陈奇瑜重蹈覆辙 | (277) |
| 第六章 “十年不结之局” | (293) |
| 二十二、“流氛震惊皇陵，责实在朕” | (293) |
| 二十三、“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昇督剿东南” | (308) |
| 二十四、孙传庭：“设伏出奇，具见调度” | (324) |
| 二十五、“恨用卿晚” | |
| ——杨嗣昌“十面张网” | (332) |
| 二十六、“十年不结之局”似可结局 | (343) |
| 第七章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 (355) |
| 二十七、“剿兵难撤，敌国生心” | (356) |
| 二十八、清兵深入二千里 | (367) |
| 二十九、“盐梅今暂作干城” | |
| ——杨嗣昌督师 | (378) |
| 三十、“功虽未成，尽瘁堪悯” | |
| ——杨嗣昌之死 | (391) |
| 三十一、“灭寇雪耻”成泡影 | |
| ——洪承畴降清 | (406) |
| 三十二、“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 | |
| ——陈新甲被杀 | (418) |
| 第八章 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 (426) |
| 三十三、周延儒复出与赐死 | (426) |
| 三十四、分庭抗礼的李自成与张献忠 | (463) |
| 三十五、一筹莫展：出征、南迁、勤王 | (496) |

| | |
|----------------------------|-------|
| 三十六、“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 (527) |
| 三十七、最后的时日 | (542) |
| 三十八、闯王进京 | (557) |
| 第九章 尾声 | (567) |
| 三十九、“冲冠一怒为红颜” | (567) |
| 四十、为明复仇旗号下的各种活动 | (574) |
| 四十一、噩耗传到南京之后 | (582) |
| 四十二、皇太子之谜与朱三太子案 | (589) |
| 跋 | (608) |

第一章 受命于危难之际

本书的传主朱由检，即位后改元崇祯，人们称为崇祯皇帝。他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当时他的祖父朱翊钧当政，他是皇太子朱常洛的第五子，上有长兄朱由校。父亲即位后仅一个月就突然病逝，长兄由校继位。在这种情势之下，朱由检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然而，历史的机缘令人难以捉摸，皇兄竟然绝嗣，他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明朝第十六代（也可以说是末代）皇帝。这是他本人始料不及的。

一、“召信王入继大统！”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二日^①，明神宗朱翊钧病逝。皇太子朱常洛在忙完了父皇丧礼之后，于八月初一日正式即位，这就是明朝第十四代皇帝——光宗。此公一生多遭厄运，到了该册立为皇太子的时候，由于父皇宠妃——郑贵妃屡屡从中作梗，迟迟不能册立。在外廷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神宗不得不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常洛为皇太子。内朝与外廷在册立问题上的长期争议，耽误了常洛作为皇太子的预教工作，使他没有受到应有的系统的宫廷教育。册封为皇太子后，又处于郑贵妃的阴影之下，接二连

^① 为叙述方便，也为符合当时实际，本书一律采用中国传统历法，亦即民间俗称阴历。

三地发生事端，使他郁郁不得志，日渐沉迷于酒色之中，以求解脱。

父皇病逝，意味着他将以皇太子身份成为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这对于长期受到压抑而谨小慎微的朱常洛来讲，是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与才能准备的。不过他毕竟是一个颇有政治头脑的人，接手父皇留下的烂摊子，力图整顿紊乱的朝政，有所作为。因此，他一反父皇晚年怠于临朝的惯例，日理万机，事必躬亲。要把多年积累下来的朝政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是一项十分劳累的工作。他的身体自幼孱弱多病，成年后又沉迷酒色，十分空虚。一旦当此重任，身体不胜负荷。这时，郑贵妃又心怀叵测地为他送来一批美女，供他享用。每天退朝内宴，有女乐承应，到了夜里，龙床上是“一生二旦”，轮流“御幸”^①。本来多病的身体，立时垮了下来。

八月十四日，郑贵妃指使原来在她宫中的亲信太监、现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昇，向光宗进通利药——大黄，致使皇上病情加剧：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褥之间。到了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官李可灼又向光宗进奉所谓仙丹——红丸。不料，连服两丸这种“仙丹”后，皇上竟于九月初一日五更一命呜呼！

九月初六日，光宗的长子朱由校仓促即位，下诏以明年为天启元年，这就是明朝第十五代皇帝——熹宗。

朱由校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即位时虚度十六岁。在此前的岁月中，父亲连遭厄运，作为长子所受的教育与乃父相比，更逊一筹。无怪乎历史学家孟森说：“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②。有的学者甚至称熹宗是光宗的“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③。这种说法，不免有夸张的成分在内，但点到了要害：熹宗确实是明朝诸帝中最无知无能的一个。他根本不曾料到，父皇即位刚

①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万历起天启四年止。

②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上册，第293页。

③ 朱东润：《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18页、25页。

一月，就会轮到他来当皇帝。

要说熹宗是一个白痴，那倒未免有点冤枉了。其实他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而且手艺颇精。当时人这样描绘这位皇上：“上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①。万历、天启间在宫中当太监的刘若愚对此有更详细的描述：“先帝（指熹宗）好驰马，好看武戏，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淅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堕，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逆贤（魏忠贤）、客氏（熹宗乳母）喝采赞美之；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先帝与亲暱近臣，如涂文辅、葛九思……等，朝夕营造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②。你看，他的创造发明、思路多么机智，手艺多么精巧，要是他不当皇帝的话，肯定能成为一名宫廷中的能工巧匠，比起那般一无所长的王孙公子要好得多了。然而他当皇帝是极不称职的。每当他与近臣潜心于斧砍刀削、解衣盘礴之际，非平素亲暱近臣，不得窥视。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魏忠贤每每乘熹宗兴致勃勃地埋首于营造时，从旁传奏紧急公文。熹宗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奏毕，便不耐烦地说：“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③。听

① 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二下，天启朝纪事。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十，禁御秘闻。

②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③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十，禁御秘闻。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二下，天启朝纪事。本书所有对话均引自原文，以下不一一注明。

任大权旁落而不顾，魏忠贤终于操纵如意，俨然成了皇上的代言人，甚至肆无忌惮地以“九千岁”自居，距“万岁”仅一步之遥。尾大不掉之势已成，熹宗对魏忠贤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特务机构）的魏忠贤。

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十八日，熹宗在乳母客氏及魏忠贤的陪同下祭方泽坛后，到西苑游乐。客、魏二人在桥北浅水处大船上饮酒寻欢，熹宗与王体乾、魏忠贤的两名亲信小太监高永寿、刘思源在桥北深水处泛小舟荡漾，相顾欢笑，俨若神仙。忽然一阵狂风，小舟倾覆，三人一齐落水，两岸随从顿时惊哗，皆无人色。幸亏近旁的管事太监谈敬等人抢救及时，熹宗才幸免一死，两名小太监因抢救不及，溺水身亡。魏忠贤专为此事在七月十五日到大高元殿作佛事法会，放河灯追荐^①。熹宗虽未淹死，但受此一番惊吓，本来不佳的身体从此每况愈下。

天启七年（1627年）夏，熹宗病情加剧，引起了群臣的密切关注。七月二十八日，河南道御史倪文焕上疏说：圣体欠安，是否饮食起居的忧劳失调？如果是这样，那么应该讲求清心寡欲^②。到了八月十一日，内阁首辅黄立极率文武百官到宫门问安，熹宗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了他们，待御医报告了诊脉情况后，便向大臣们说：圣体素来虚弱，近来因辽东战事焦虑劳累，终于病倒。目前正在静心休养，凡是重大朝廷政务，全由阁臣与厂臣计议商确，用心赞襄^③。看来，熹宗自知病入膏肓，已在安排后事了。

次日（八月十二日），黄立极率九卿科道等官再次来到乾清宫

①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逆贤乱政纪略。《三朝野记》卷三下、《先拨志始》卷下所记略同。

② 李长春：《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天启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③ 同上书，天启七年八月十五日。

西暖阁接受皇上召见，大臣们知道皇上“圣体”尚未能“霍然勿药”——还未好转的一种委婉表达方式。在召对中，大臣们察觉到皇上虽在汤药诊调之中，却不忘轸念国事。这也怪，身体健康时对朝政从来不感兴趣，到了生命垂危之际竟轸念起国事来了，大概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少顷，皇上向大臣们发布了他在位时最后一道谕旨，除了再次重申他对监臣王体乾、厂臣魏忠贤信任之外，透露了昨天单独召见他的五弟信王朱由检的事^①。召见的内容没有明说，召见的用心是十分明白的——要信王入继大统，熹宗让大臣们预先知道，由信王继承皇位是他自己的安排。

熹宗何以要传位给五弟由检呢？实在是事出无奈，因为他本人没有子嗣。查《明史·诸王传》，熹宗有三子：慈炆^②、慈煇、慈炆，都幼年夭折。

他的长子慈炆，是皇后张氏于天启三年十月十二日所生。《明史·诸王传》竟糊里糊涂地说：“怀冲太子慈炆，不详其所生母”。而《明史·后妃传》在懿安皇后条却写道：“（天启）三年，后有娠，客、魏尽逐宫人异己者，而以其私人承奉，竟损元子。”明明白白指出皇后是长子的生母。同一部书，相隔不过寥寥数页，自相矛盾一至于此，众手修史的弊端于此也可见一斑。幸好有其他记载可以作证，否则岂不成了一桩无头公案！《国榷》天启三年十月己巳条可与《明史·后妃传》相互印证：“皇长子慈炆生，旋殇（中宫出）”^③。皇后诞生长子，在明代并不多见，非同小可，日后理所当然成为皇太子、皇位继承人。如此一个宝贝，为什么竟会“旋殇”呢？

原来是客氏、魏忠贤在背后捣鬼。

孕育皇长子的皇后张氏，名嫪，字祖娥，小字宝珠，河南祥符

① 《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七，天启七年八月乙巳。

② 熹宗诸子的名字，都从“火”字旁，此炆字不同于然字。

③ 谈迁：《国榷》卷八十五，天启三年十月己巳。